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青年话思想

“政治生态”：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标识性概念

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应着重处理好四组关系

□林韬杰 赖喜娜 赵建仓

□张韵晗

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概念创造性地引入党的建设领域,将生态学的整体性、系统性、动态平衡等理念融入党建实践,对党内整体环境、关系结构和运行生态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提出“政治生态”这一重要标识性概念。

“政治生态”概念的生成发展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首次提出“政治生态”这一概念,明确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这一概念的提出,正值党的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拉开序幕之际,内含“净化”的实践要求与“从严”的政治基调,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理论标识。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进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性,他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此时,“政治生态”已从对作风问题的具体回应,发展为对党的建设全局性、根本性问题的理论把握。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一论述将生态思维融合进党建领域。2017年,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写入党章,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要求转化为党内法规制度,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度融合。2022年,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要求,将其纳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之中。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将“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总结为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之一。这一重大科学判断,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从党的建设的具体议题,提升到关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关乎党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时代课题的重要维度。

从“净化政治生态”到“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这一概念始终与“自我革命”的核心命题同频共振,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协调推进,逐步从政治话语发展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标识。

“政治生态”概念的基本内涵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或领域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风的综合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这一论述为“政治生态”概念赋予了丰富的理论内涵,可以从目标、建设、价值三个维度对其进行阐释。

在目标维度上,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是理想图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政治生态是检验我们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尺”。因此,必须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所谓“风清气”,体现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所谓“气正”,体现为正气充盈、党性纯正,即理想信念坚定、政治操守端正、用人导向

公道。“风清气”与“气正”之间相互涵育、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政治生态的一种理想状态。只有达到和保持这一理想状态,才能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在建设维度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这深刻揭示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全方位、全领域的系统性工作,要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在价值维度上,良好政治生态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一方面,政治生态清明,干部才能心无旁骛干事创业,各项决策部署才能不折不扣地落地见效。另一方面,良好政治生态能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在凝聚人心的同时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政治生态”概念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政治生态”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政治生态”概念的提出,开创了党的建设理论的“生态范式”。习近平总书记以“森林”与“树木”的关系阐释政治生态建设中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

提出“下大力气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的经典比喻,将生态思维创造性运用在党建领域。这一范式打破了传统党建理论从理想信念教育、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要素维度分别推进的范式,将各要素共同置于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中加以审视,实现了从“要素思维”到“系统思维”的理论跃升。在这一范式下,党的建设被理解为一项系统工程,党的各项建设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

随着“政治生态”概念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等重大命题,深刻揭示了政治生态对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作用范围由党建领域拓展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和时代意蕴。

“政治生态”概念的提出,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特色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将“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列为大党独有难题之一,这本身就体现出对这一概念的战略价值的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大的样子”,不仅在于党员人数和组织体系的超大规模,更在于格局之大、理想之大、责任之大。因此,要通过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证。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粤BA粤超·启示录

做强粤BA、粤超赛事IP 为体育强国建设的湾区实践赋能

□董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后全运时代,广东牢牢把握发展机遇,以粤BA、粤超两大本土群众体育赛事IP为核心抓手,通过一系列重磅举措与标志性成果,在南粤大地与港澳热土上书写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劲的湾区动能。

薪火相传:以赛事IP点燃全民健身新热潮

全运会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竞技体育的精彩对决,更在于对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落实。后全运时代,广东持续传承“全民全运”的理念,以粤BA、粤超两大群众体育标杆赛事为核心载体,推动群众体育事业多点开花、全面升温。

2026年3月开赛的粤BA(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覆盖全省21个地市,以“一战城名、粤战粤勇”为主题口号,严格限制职业运动员参赛,让本土草根球员成为赛场主角。赛事以珠江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大片区,共21支地市代表队、422名本土球员参赛,累计开展124场高水平对决,线下累计观赛人次超56万,全网播放量超17亿次,成为群众“三大球”发展的标杆样本。2026年9月粤BA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举行,邀请香港、澳门代表队同台竞技,成为粤港澳三地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

与粤BA形成双轮驱动的粤超(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同步构建起全省全城赛事体系,锚定民间足球发展定位,打造大湾区群众足球第一赛事IP。2026年4月开赛的粤超,覆盖全

省21个地市,东西两大赛区共21支地市代表队、826名球员参赛,全程采用主客场制,合计123场比赛,赛事横跨7个月,所有球员均无执业注册记录,严格执行业余球员参赛标准,让赛事真正回归民间、服务群众。珠海等毗邻港澳的赛区,依托“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政策便利,吸引港澳球迷跨境观赛,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湾区观赛场景。

粤BA、粤超共同构建起广东群众“三大球”发展的双核心格局,让群众体育成为全民健身的核心引擎。

固本强基:以赛事落地筑牢体育设施硬支撑

推动全民健身,离不开完善的体育基础设施作为坚实根基。广东以粤BA、粤超赛事全域落地为牵引,持续推进体育设施的提质升级与开放共享,着力破解群众“去哪儿健身”的难题,为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

十五运会超九成比赛场馆由既有场馆改造而来,在全运会史上首次实现不新建任何大型场馆,践行了“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原则。赛事落幕之后,这些场馆全面向公众开放,实现了从竞技赛场到全民健身阵地、草根赛事主场的无缝转换,其中广东奥体中心、天河体育中心等核心场馆,赛后改造为集赛事、健身、文化功能于一体的体育综合体,服务市民日常健身需求。

承接粤BA、粤超赛事的各地市场馆,持续深化惠民开放,结合赛事开展群众体育嘉年华、青少年体育培训等活

动。以赛事为纽带,各地推动场馆运营与社区服务、商业配套联动,实现“办赛一场、激活一片”的场馆利用效应,让场馆资源通过群众赛事实现全民共享、高效利用。

业态焕新:以赛事经济激活体育产业新动能

广东以粤BA、粤超两大赛事为核心牵引,大力发展“体育+”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体育产业全链条升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持续释放双赛事IP的辐射带动效应,广东以粤BA、粤超为核心打造赛事经济全链路体系。

粤BA赛事期间,各地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肇庆推出文旅优惠,客队参赛人员及其所在城市市民可免票游览热门景区;广州全市重点A级景区对持观赛票的观众给予门票优惠;佛山派发“票根消费券”大礼包。赛事对消费的拉动效应显著:清远单场比赛直接带动消费约900万元;东莞首轮比赛带动周边酒店入住率增加至九成,景区客流同比提升20%;深圳在“五一”假期,开展票根福利叠加有奖发票活动,全市住宿业开票金额同比大涨190.3%。

粤超同样为赛事举办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拉动效应,各地依托主场赛事打造城市体育消费场景,将观赛与本地美食、文旅资源结合,形成“观赛+美食+旅游”的一体化消费模式。珠海等湾区城市依托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打造“体育微度假”产品,探索跨境体育消费新路径,吸引港澳球迷周末跨境观赛消费。

同心聚力:以赛事为纽带书写湾区融合新篇章

十五运会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大型体育赛事,为湾区体育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后全运时代,广东以粤BA、粤超赛事为纽带,持续深化粤港澳体育交流合作。

今年9月举办的粤BA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就是十五运会联合办赛效应的生动延续。粤BA东西区全明星队、香港队、澳门队四支队伍同场竞技,赛事期间,相关方面还组织三地参赛队伍走进校园、探访智造产业基地,促进青年互动交流,让赛事成为连接三地青年、凝聚湾区共识的重要纽带。粤超则依托珠海、中山等城市的区位优势,为港澳球迷提供观赛便利,持续深化民间足球领域的湾区交流。

产业协同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体育事业发展扶持办法》,围绕支持举办体育赛事活动、鼓励琴澳体育交流合作、支持体育俱乐部发展和鼓励青少年体育发展等多方面,提出具体扶持措施,深化琴澳两地在体育事业领域的合作,共同探索湾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从粤BA、粤超赛事IP点燃全民健身新热潮,到赛事落地推动体育设施提质升级,从以赛事经济激活体育产业新动能,到以赛事为纽带书写湾区融合新篇章,广东在后全运时代的一系列生动实践,持续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作者系广东工业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

当前,人工智能深入发展、广泛应用,但人工智能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带来治理挑战,如何以“善治”促进“善智”,成为全社会共同关

要处理好“技术跃迁”与“社会接纳”的关系

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首先应从技术维度入手,首要议题是弥合技术跃迁与社会接纳之间的鸿沟。技术快速演进与社会迟滞认可之间的张力,现已成为制约智能技术深度应用的主要障碍。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关键技术的突破,助推一批头部企业快速实现从“工具性整合”向“平台化统辖”功能跃迁,进而积累了赋能千行百业的澎湃势能。

然而,智能技术的高度复杂和不可解释等“黑箱”特性无可避免地引发广泛社会性担忧,公众对智能技术应用存在隐私泄露、风险外溢、责任模糊等诸多担忧和困惑。此外,公众对智能技术应用更深层次的担忧,还在于其正加快重塑人机关系界限并

要处理好“效率提升”与“分配公平”的关系

促进生产效率提升是人工智能最直接的经济影响,但若片面追求效率,将会影响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人工智能的高质量发展应当统筹效率与公平,最大程度确保技术发展红利由各参与方互惠共享。

从效率层面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推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和生产关系重构,“黑灯工厂”、无人驾驶、智能配送等一批高效率场景迅速落地,为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现实解决方案。然而,效率提升的背后却隐藏着分配公平风险。从公平视角审视,某些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为算法迭代、模型训练等关键技术攻关贡献了大量行为数据。但在技术实现规模化商用之后,部分从业者或将面临职业替代的潜在风险,难以充分分享技术发展红利,甚至可能承受算法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算法偏见

注的焦点问题。当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亟需处理好技术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秩序与活力、发展与安全四组关系。

要处理好“技术跃迁”与“社会接纳”的关系

挑战人类情感、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这些现实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对智能技术的接纳程度,进而可能阻碍智能技术势能向经济社会发展动能转换的进程。

因此,处理好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需要率先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也是优化智能技术应用环境的题中之义。化解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社会”张力,需从研发和应用两端着手予以干预。在研发端,要促进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对齐,确保技术设计本身内嵌“技术向善”的理念和准则;在应用端,要通过“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等必要手段评估技术的社会适用性,确保进行合乎伦理规范和主流价值观的产业应用。

要处理好“秩序稳定”与“创新活力”的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呈现强赋能性、强颠覆性、强战略性耦合叠加特征,这决定了针对人工智能的治理务必要统筹平衡好秩序稳定和创新活力的关系。

建立健全富有韧性、适度超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框架,是确保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竞争中赢得技术主动权、抢占产业制高点的必要前提,这有助于提升人工智能创新活力并加速智能技术迭代升级。但同时,若政策框架与当下实际条件、现实需求不相适配,如“管得太死”或“放得太松”,则容易导致智能技术创

新不足或治理失序,进而错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窗口机遇,抑或掉入新兴技术的负外部性陷阱。

因此,在秩序与活力之间寻求平衡点,是当前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的关键制度设计问题和核心政策安排议题,事关智能技术能否始终沿着国家和地区既定的战略规划持续有序迭代升级,并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正向促进作用。维系人工智能发展的“秩序-活力”平衡,需要针对不同领域风险评级并且精准分类施策,构建张弛有度的制度框架,深化韧性治理。

要处理好“发展趋势”与“安全可控”的关系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推动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原则,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处理好其发展与安全问题尤显关键。

人工智能技术自身发展及其作为工具赋能千行百业发展,是理解人工智能发展逻辑的两个主要维度。但无论从哪个维度讲,驱动人工智能发展都务须确保安全可控。相较于人工智能自身内蕴的“黑箱”等技术风险,其在赋能千行百业过程中因被滥用、误用、错用、误用而引发的市场风险、社会风险、伦理风险等更加令人担忧。尤其在我国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的政策背景下,智能技术在各领域规模化落地,随之衍生的各类安全问题,值得各方予以高度重视。因此,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是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的长期性目标和根本落脚点,驱动发展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目,安全则是智能技术应用的关键底线,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天平两端,偏重任何一端都将破坏系统稳定,唯有动态平衡发展与安全,方能确保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

统筹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安

全”目标,应加大力度实施全周期敏捷治理。在研发阶段,要建立严格的安全评估机制,对新技术的潜在风险提前进行评估把关;在应用阶段,要构建实时监测与预警体系,实时跟踪技术应用情况,根据变化灵活快速采取应对措施;在总结阶段,要及时复盘梳理治理经验和教训,避免僵化的治理机制,持续迭代优化治理体系,健全包容试错、动态调适的治理机制。

作者单位:林韬杰,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赖喜娜,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赵建仓,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注:本文系2022年度广州市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专项“广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揭榜挂帅项目”(20220602JB-GS04)、琶洲实验室自立项目“广州重点领域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研究”(PZL2022ZZ00011)、琶洲实验室运行期成果产业化体系建设研究”(PZL2024ZZ0001)的阶段性成果